

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以明恩溥、何天爵以及麦高温为考察中心

王小惠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在清末传教士所勾勒的中国全景图中,中国形象的正向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给予中国以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传教士通过如下三方面来概括出中国的大致特征:重视繁衍,却无生命意识;伦理本位,以道德替代宗教;笃信教育,只为念书做官。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现实存在的中国,其原因在于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形象来考量中国,以基督教学说来改变中国。

关键词: 清末传教士; 中国形象; 基督教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297(2012)01-0079-04

在马可·波罗、葡萄牙修士伽斯帕·达·克鲁斯、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多明各会传教士多明各·纳瓦雷特修士等人笔下的中国是一个富庶且神秘的东方国度,加之这些人的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所以在13世纪中后期后,欧洲人一直信奉着中国乌托邦的神话,视中国为追随榜样,十分艳羡中国的悠久、广袤、繁荣、富裕、开明以及充足。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原有的正面形象轰然倒塌,并迅速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特别在传教士所勾勒的中国全景图中,中国形象的正向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成为了专制、保守、蒙昧、贫穷、自私、虚伪、麻木、浪费、软弱、异教等的代名词。

—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和《中国乡村生活》、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以及麦高温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是体现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想象中国的代表性文本。并且在雷蒙·道森的《中国变色龙》、M. G. 马森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以及哈罗德·伊罗生的《美国形象》等著作也相应地收集了清未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言论或其他方面的资料,完善了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传教士们在论述上各有侧重,但基本上覆盖了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经济生活以及社会道德的方方面面。在清末传教士眼里,中国有如下三大特征:

(一) 重视繁衍,却无生命意识

在传教士们的眼里,中国人的生命就像是河岸上的草,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无所

谓,根本不会去思考生命,但是中国又十分重视繁衍。“毫无疑问,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或更成功地维持自身的繁衍。”^{[1] [P202]}。这一点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观照。

首先,中国没有“儿童”。幼者、儿童是“奴仆之奴仆”,不得不承受“百般之劳苦”,完全得不到儿童应有的照料。而孩子的灾难远不止这些,最令人寒心的是大量溺婴现象的存在。一个普通的妇女毫无顾忌地亲手杀死了11个自己所生的女婴,事后竟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反而将此作为谈资,令人瞠目结舌。溺婴现象主要是女孩的灾难,而中国男孩子生了重病后,灾祸也紧随而至。在《真正的中国佬》中,何天爵就记载着,当一个中国孩子生病之后,他的父母会耗尽家资来求医问药,细心照料,但是当一切处方、一切手段都宣告无效,也即是孩子濒临死亡的边缘时,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那可怜的小东西会被浑身剥得精光,然后将其放到院子里的泥土或者砖块上”^{[2] [P134]}。最后这些孩子的命运是大多被当做垃圾扔进运尸车,“每天晚上,这些运尸车都穿行在大街小巷,它们把那些可怜的小尸体抬起来。其中有些早被狗啃得断肢断臂,面目全非”^{[2] [P133]}。

其次,中国没有“女人”。“男子为神所造之物,而女子不过其副物也。斯语也,也之为称支那妇之说,则颇显。”^{[3] [P155]} 中国妇女被各种清规戒律束缚着,是丈夫的代言人和玩偶,但是作为母亲,她们的法力无边,“母性控制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突出和异常重要的实际权力”^{[2] [P63]}。中国妇女身上的女性权力与母性控制力不和谐地发展着,

* 收稿日期:2011-06-05

作者简介:王小惠(1985-),女,四川通江人,西南大学文学院09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

使其具有羔羊般温顺的一面,但是面对弱者时,她们又是狮子,非常残忍,严重违背了女人的自然天性,消解了其生命的意义。女人的天性被强行抹杀,而女儿的内涵被器物化,那么中国的女人就类似于植物或动物,浑浑噩噩地占有着生命,却从未拥有过真正的生命,不知“生命”为何。

最后,中国多“看客”。中国的民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每当同类被残害之时,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免费看了一场悲壮剧,而如果显得惊恐,他们又欣赏了一场滑稽剧,毫无恻隐之心。麦高温就有幸目睹过一个抢劫犯所受到的“钉刑”。“刑具由一根竖立的木桩和一根横梁组成,构成一个十字的形状。从木桩上又伸出两块木板,既用来供犯人站立,又用来钉犯人的脚。木桩的上部有一根横梁,其高度与犯人的肩膀持平,犯人的手掌被钉在横梁的两端……”^{[4] [P144]}此时这个受刑者异常痛苦,但他的痛苦却让看客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成百上千的人都渴望看到这个人是如何受刑而死的,因而都涌到了即将行刑的地方”^{[4] [P144]},并且受刑者的痛苦让看客们颇感快乐。其他比“钉刑”更严酷的刑罚还有,如“囚笼”、“站笼”以及“凌迟”,这些刑罚给中国人所带来的刺激与快活,“不过像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5] [P331]}。总之,在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犹如被细腰蜂用毒针蜇了运动神经的小青虫,不死不活,没有童性、女性以及人性,非常麻木,毫无生命意识。

(二) 伦理本位,以道德替代宗教

在传教士们看来,中国缺乏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用儒家道德替代宗教,从而让人们循规蹈矩地遵守那些推行了几千年的某些规范和礼仪习俗。何天爵就很难理解孔子如何被逐渐认可并变成了一个宗教信仰体系的创立者,并指出孔子一生写过很少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写过可以称为宗教内容的东西。但是他认为孔子虽非一名信徒,却是一位圣人,苦心孤诣地用一套伦理道德体系来塑造中国。同时,传教士们也仔细研究了此套道德体系在中国人身上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中国人好战,却不具有侵略性。麦高温认为,中国人基本上算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但是他又强调中国士兵的素质更多地体现于自卫战之中,很少去征服外族,毫无侵略性。对于中国人好战却无侵略性这一点,其他传教士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人相当重视家庭生活,信奉家庭伦理道德,不愿意奔波他乡,更不说去到异国殖民了。“如果不彻底改变自己的天赋性格,中国人将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踏遍世界的殖民者。”^{[2] [P66]}

其次,中国人重礼节却无公共心。在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严守伦理道德,非常重视礼节,每日必守三百之礼仪,遵从三千之威仪,但是他们却认为中国人的礼节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并非由于诚心而出,只为保持等级秩序。同时传教士们认为,中国人过度迷信家庭伦理,以家族责任替代了对公众的义务,缺乏以政治形式来组织他们的能

力,毫无社会良知。由于缺乏公共心,中国人根本没有民族责任感,没有爱国情感,例如“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同盟军之迫北京也,英人自山东省之支那人之处,购骡马以供负担之用”^{[3] [P80]}。更严重的是,传教士们认为,公共心欠缺会让中国政府行政职能的运作非常松散。何天爵指出,中国的地方官吏拥有无边无际的权力,却没有公共利益的概念,就会“对朝廷的其他谕令似乎可以充耳不闻,逍遥自在”^{[2] [P27]},这就为贪官污吏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中国人极度崇拜祖先,信仰迷信观念。传教士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信仰领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祖先的位置,哪怕只是一瞬间的。中国人把整个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都依赖死去的祖先,把对祖先的极度崇拜当做民族中的头等大事。但是让传教士不理解的是,“人们之所以崇拜祖先,仅仅是因为害怕如果忽视了他们,财富会随之消失殆尽,而无穷的灾难将会降临到子孙后代的头上”^{[4] [P75]}。因而可看出中国人对祖先绝对缺乏崇敬,缺乏真正的感情或者说是一种奉献精神。对中国人而言,他们之所以去崇拜祖先,要么出于害怕,要么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然而“这种崇拜过于深奥也不太具体,而且不能很快地帮助为生存而斗争的中国人应付经常面临的问题”^{[4] [P100]}。针对此问题,许多家庭和庙宇都供奉着无数的神像,“因为这些神可以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立即进行干预,而不像他们已过世的祖先那样以一种较为缓慢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这就使中国陷入到宗教虚无主义的状态之中,继而让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心态浸透着迷信的气息,并由此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三) 笃信教育,只为念书做官

传教士们认为,中国人不论地位的高低或者财富的多少,都对孩子有着殷殷希望,绝对地相信教育。“‘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2] [P191]}这表明,在中国读书求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步入仕途,从而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念书做官”的教育理念也深深地塑造着中国。一方面,让中国的文人阶层势力强大。在中国,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书生,从而有可能享受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通向荣誉最正当的途径就是教育”^{[4] [P36]}。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也必须从文人中选出,“那么这个阶层在国家中是多么强大和有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了”^{[4] [P36]}。麦高温认为,中国文人阶层的力量强大,居然在那些落榜的书生身上都能体现得十分明显。虽然那些未通过任何考试的书生没有获得任何官职,但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在学校中做老师,是所在村镇的领导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的地位远远地高于普通老百姓。在解决与官府产生的矛盾、村庄之间的长期不和以及阶级争斗的时候,人们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他们也自然地居于领导地位。”^{[4] [P37]}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人极其看重“读书做官”之路,

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与精神心态似乎都陷入到四书五经的迷雾之中,却忽视对其他知识的学习,使中国进入到“无医生”、“无律师”、“无科学家”等的状态之中,严重缺乏专业人才。麦高温认为,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学和解剖学的专门研究,使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一些医学知识当上医生。总之,传教士们一致认为,中国人所受教育的最终结果并不是让大脑装满知识,却起到了“洗脑”的效果,消灭了人最本真的思想与情感,从而变得循规蹈矩,服从统治与权威。何天爵强调,中国教育为适应科举制度,大力推行“填鸭式”的教学,让儒家经典成为完完全全的迷信教条,驾驭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同时何天爵用一种调侃的态度来评价这一教育体制,认为它只完成了如下使命而已:教授阅读和写作,培养锻炼并强化了记忆力,“可以说,通过这一体制培养造就的中国学生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绝非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能比拟。”^{[2] [P196]}。

虽然传教士们对中国的教育观持极不欣赏的态度,但是他们却对中国的官僚系统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颇为赞同,认为中国选官通过科举考试,让那些缺乏世袭特权、没有地位与财富的寒门子弟具有了平等的机会去分担行政职务。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对中国的印象非常糟糕,却对中国公平选官的方式较为赞赏,指出在中国选官之时,财富、庇护、友情以及青睐均不起作用,惟有才干、优点、智能以及锲而不舍,即使是最贫穷和最卑贱的人,只要拥有了这些才能,也能梦想成真。“唯才是举”的选官方式是传教士们很少肯定的中国的正面价值之一,因为它实现了人人平等,摒除了地位、财富的障碍,让真正有才华的人去承担国家的行政权力。

二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我们所宣扬的有关中国的理想与我们在中国的实践之间总露出一个奇怪的距离”^{[6] [P272]},以及“在我们民间传说中关于中国的形象包括几种类型——异域的、理想化的、幻灭的、社会学的——这些形象现在回顾起来,似乎不足以恰当地描绘中国的现实情况”^{[6] [P273]},并提到明恩溥牧师在他的《中国人的特性》中对中国产生的幻灭之感源于,“在一个较低的生活标准过于接近而又无法理解的接触之中”^{[6] [P274]}。并且传教士何天爵也承认“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他们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任何神奇的虚构和猜测都要丰富有趣得多,对于中国人也是如此。”^{[2] [P3]}这表明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并非现实存在的中国。产生此状况的原因,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关照。

(一) 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形象考量中国

19世纪期间,西方的工业、社会和政治革命为其带来了凤凰涅槃式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诱使人们把文明形

象化为一个标尺,由此衡量出欧洲比世界其他地区都要进步得多。”^{[6] [P94]}像明恩溥、花之安、何天爵、麦高温以及麦都思等清末传教士在想象中国之时,也自然回避不了西方物质文明这一标尺。“传教士也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把西方发达的文明归之于它们是基督教国家这一事实。”^{[7] [P314]}。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从孔子对自然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指出儒家学说的局限性。但是在孔子所生活的年代,几乎没有国家曾对自然科学进行过研究,那么理雅各的结论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为他用19世纪欧洲的文明成就来嘲笑中国公元前6世纪没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以及农业科学,这显得荒谬且无理。不只理雅各,其他传教士在表述中国时,时常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认为中国的文人都是些“无耻之徒”老师是“聪明的无赖”,医生是“聪明的流氓”,祖先崇拜是“错误信仰”,神庙是“狗窝”,而中国的经典作品“包含着大量无关紧要,毫无价值的糟粕”^{[2] [P197]}。总之,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拙劣的糟粕,废话连篇,形同垃圾。那些东西应当由警察去查禁”^{[2] [P208]}。以上判断的关键在于,中国是通过传教士之口说话:中国的落后、失败以及绝望突显出西方的辉煌与骄傲;同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责难本身即是西方工业文明的胜利。

在麦高温认为,中国的孩子行为粗野且少教养,有着一副似乎属于下等人的长相,并且他把中国孩子看上去地位卑微归因于中国服装质量的低劣和式样的死板。在麦高温凭借物质的发达来嘲笑中国孩子的过程中,其沾沾自喜的面孔展露无遗,显现出西方视角的优越性。与麦高温一样,明恩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讽刺了中国人的节俭。他认为中国人“不认罹传染病而死者之兽肉为有害于卫生”^{[3] [P6]},吃死狗死猫之肉,用薄锅之底,燃树叶之薪材,因省油而凿壁偷光,善于利用衣料。并且明恩溥还津津乐道地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西洋有一妇人,曾见支那之母,以满勺之沙,掷其子,然后以一本之旧帚扫之。乃问之曰:卿每日使子入浴耶?彼之母佛然而答曰:何每日入浴也?我子自诞生之后,至今不过一回耳。”^{[3] [P8]}其他传教士像明恩溥一样,用西方物质文明来理解中国,把西方的富裕充足与中国的贫困倒退作了相应的比较,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去炫耀西方的工业文明,“在他们向中国人传播深奥的基督教教义之前,他们经常向中国人宣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7] [P15]}。

(二) 以基督教学说改编中国

清末传教士用基督教学说来改编中国,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方面采取瞒与骗的方式来消除文化障碍。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下令禁止中国教民“祭祖敬孔”,引起了“礼仪之争”,最后康熙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但是在清末之时,传教士为避免正面的冲突,就用瞒与骗的方式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基督教化、西方化,以契合自己传教的需要。在《真正的中国佬》中,何天爵把中国的皇帝改造成上天为中国派来的大牧师,同时强调皇帝的威权主要源自于他神圣的使命。不仅把中国的皇帝基督教

化,使其成为“大牧师”,而且传教士也善于去开发一些儒家圣人。理雅各认为,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就差不多与巴特勒主教的观点相符合,并且他还宣称,孟子那些与人性有关的观点几乎没有与基督教《圣经》相违悖。如果实在“瞒”不住了,还可以“骗”。何天爵反复渲染着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救世主耶稣即将降临人间时,当时中国皇帝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中有人数次告诫他说,西方不久便会有一个大大智慧的人物诞生,并建议皇帝最好派遣一个使团,邀请他来中国。何天爵编造了这一故事,期望凭借皇帝的公众影响力来确立耶稣的地位。不仅如此,何天爵还发挥了孔子的力量,因为孔子说过“西方有圣人”,正由于此话,于是皇帝便真的派了一个使团前往西方,最后漫游到印度,错把佛教带到中国。通过歪曲玄奘西游,来为基督教在中国骗取话语资本,收拢人心。

另一方面,过度攻击中国人的“软肋”之处,为自己的传教活动做辩护。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从中国人的“体面”、“节俭”、“礼仪”、“时刻之浪费”、“不精确”、“蒙昧”、“误解之才”、“轻蔑外人”、“公共心缺乏”、“同情之欠缺”等二十多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挖中国人的“祖坟”、“批劣根”以及“撕面具”,费尽心思地来找出中国人方方面面的软肋,最后定义中国是“支那之社会,犹如其国之景色。支那之景色,远望之,则风光甚可爱;亲入其城,则家屋概粗恶,而多贫民,到处不洁,至使人催呕吐”^{[3] (P226)},并认为中国人从未幸福过。总之,明恩溥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幸福,存在着很多缺陷,但基督教能够让中国人获得道德和心智上的双重启蒙,能提供“一个新社会秩序的协作,戒律和榜样的刺激,以及适当的道德制裁”^{[1] (P268)},能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能净化与柔化中国家庭等等,从而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幸福与和谐。从明恩溥的身上可看出,清末的传教士评说中国的动机十分暧昧,因为他们具备着破坏性与创造性的双重内涵:一方面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使其堕入万丈深渊,妄图破坏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

又赏赐给中国以基督教,期望使其成为中国人生活信仰的唯一来源。

其实就像明恩溥眼中的中国人一样,传教士们也喜欢用自己所认同的一套模式去想象与猜测中国人,而不是立足于客观现实。自从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西方传教士能够大摇大摆地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截然相反的文化观念与历史传统使传教士们感到中国的许多东西都难以理解,不可思议,更别说认同了^[8]。传教士身份特殊,可以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清末传教士对中国的个人评述很容易植入西方人的大脑,逐渐纳入到社会集体想象物之中,并且一直发挥着它的“功用”,至今都还影响着当代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美)明恩溥. 中国乡村生活[M]. 陈午晴,唐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美)何天爵. 真正的中国佬[M]. 鞠方安,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美)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M]. 佚名,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英)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 朱涛,倪静,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英)雷蒙·道森. 中国变色龙[M]. 常绍民,明毅,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 (美)马森 M G.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1840—1876[M]. 杨德山,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钱群英,涂传飞,黄世相.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Image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Missionaries' Eyes With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ester Holcombe, John Macgo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ANG Xiao-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norama of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 drawn by the missionaries, there was little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except backwardness, failure and disaster. The missionaries summed up the general features as follows: too much breeding without sense of life; ethics the first and morality as religion; stress on education but study only for office. But the image of China was not a true one because they looked at China with an eye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ried to change China with Christian doctrine.

Key words: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mage of China; Christia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张璠)